追风的勇气 ——读《椰壳碗外的人生》

刘琪

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，每个人，都会有自己的“comfort zone”，中文或可译为“舒适区”。这种舒适，是因为你安逸地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环境中。很多时候，人们都不愿意走出舒适区，因为这意味着挑战，意味着你将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，意味着极大的勇气。

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(Benedict Anderson)，显然是少数的例外。

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在阿姆斯特丹，约1958年

在学界，安德森的赫赫大名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那本《想象的共同体》，被政治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奉为圭臬。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，大致是在十年前，记得当时曾被作者的开阔视野与旁征博引所震撼，对里面的核心观点——“民族，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”更是印象深刻。从此，便对这位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。是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，才能让一位学者能够自如地在古今之间穿梭，在欧美大陆与东南亚新兴殖民地之间游走，随意采撷官方与民间的各种材料，构建出如此具有挑战性却又发人深省的论述？

感谢这本《椰壳碗外的人生》，终于为我的困惑揭开了谜底。

正如戴锦华教授在“写在前面”中说的：“捧读它的，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《想象的共同体——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，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，望向以生命贯穿‘二战’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、后来者。”最早阅读这本自传，纯粹是因为对安德森人生经历的好奇，但在读完之后，我发现，这并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自传，它既是对时代的记录与缩影，亦是对学术研究真诚而深刻的思索。

全书的叙述，大致是按照时间脉络进行的。在前面三章“移动的青春”、“区域研究”、“田野工作”中，安德森讲述了他儿时的回忆、成长的历程、在康奈尔求学时的故事，以及他在印尼、泰国、越南等地的田野研究。第四章“比较的框架”与第五章“跨学科”，记录了他对学术本身的思考。第六章“退休与解放”，多了几分闲适的意味。最后的“跋”，则可被视为全书的总结与升华。

成长与求学：穿越新旧时代

“从地理上讲，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、比较性的人生观做(无意识的)准备。行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，我的生活足迹已经遍及中国云南、美国加利福利亚和科罗拉多，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独立生活过。我是被爱尔兰父亲、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。法语是一种(秘密的)家庭语言；我喜欢拉丁语；我父母图书室里的书籍作者包括中国人、日本人、法国人、俄国人、意大利人、美国人和德国人。”

这是安德森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概括。他将自己称为“边缘人”，说自己过着一种无根的、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可能是并不美好的回忆，但安德森却赋予了它正面的意义，因为这为他带来了多重依恋，并使他后来能够迅速爱上东南亚的国家与文化。

从成长经历来看，安德森可被视为穿越新旧时代的人。在爱尔兰，他被送进了一所贵格会小学，并在母亲的建议下学习了拉丁语；此后，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，他又接受了良好的古典学训练。安德森写道：“我是在一个旧世界行将终结的时代长大成人的。我把自己享受到的优质旧式教育视为当然，浑然不知我差不多属于最后从中受益的那帮人。”安德森早年所受的教育，使他带有一种浓厚的怀旧情怀，也使他后来始终以一种冷静的眼光看待新时代。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中，安德森曾把民族主义与“古典的共同体”之间进行对比，认为后者以语言的神圣性为中心，而正是这种神圣性的式微，才为世俗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机会。这种极富创造力的思考，或也与他早期的古典学与拉丁文训练脱离不了干系。

1958年，在安德森22岁的时候，他来到了美国。这个时候，世界正在二战尚未散去的硝烟中重组，传统的欧洲强国开始衰落，美国则作为新的霸主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，也影响到了象牙塔中的学术，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一项，便是“区域研究(area study)”，尤其是东南亚研究在美国的出现。

在安德森看来，这种研究的兴起有两方面原因：首先，传统古典学的地位迅速衰退，关于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实用研究受到政府的青睐，政府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；其次，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，“世界共产主义”的幽灵总是让美国高层感到威胁。对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，此前的各个欧洲帝国一直满足于进行内部瓜分，因此，他们仅仅各自关注于自己的殖民地，而美国，则带着支配整个这片区域的野心，将其视为了一个整体。就这样，“东南亚”一词开始稳定而普遍地被使用，安德森就读的康奈尔大学，则成为了从体制上推进东

（下转14版）

（上接12版）

实地考察，故能巨细靡遗深入地分析。而他对“境”的剖析，尤有所见地。

又，斯波收入“岩波文库”的《华侨》(1995)，虽是综合性的论述，但仍能窥见他卓越的史识。斯波点出16世纪以降，华人离境出外讨生活从“华侨”到“华裔”的不同类型及变化，实一针见血。

王国维于其备受推崇的《人间词话》曾提出“境界说”，倚之品评中国诗词；殊不知史学作品也有“境界”高下之分。斯波在日本传统汉学的基础之上，娴熟运用巨量、多样的中文资料，加上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，尤其是年鉴学派的精华，遂得成就其名山采铜之作。盖斯波以一人之力，兼治中、日、西方之学，委实难得。余先生便赞誉他“史学境界”甚高。而询之日本代表性的学者则均众口一词，倘有国际大奖，则非他莫属！

斯波在本国事业发展的初期，颇受波折，最后方才回归东大母校任教。之后则出任汉学研究重镇“东洋文库”的理事长、文库长，因经营有方，名闻中外，为士林所推崇。又他得奖无数，胸前挂满了勋章，2003年受邀担任“中研院”史语所“傅斯年讲座”，甫回国即膺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，从此得奖连连，若以天皇名义颁发的“瑞宝重光章”等等。更在2017年获颁日本最高荣誉的“文化勋章”。2018年则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)合得唐奖汉学奖，攀登荣耀的巅峰。

以一个外国人研究异文化，最终能受该文化的肯定，其欣喜可想而知。在唐奖典礼，于他哽咽致词里，斯波除却感谢恩师早年的教导，尚致谢了许多于其问学过程里助其成学的中外学侣，足见他非但谦逊过人，而且是个情义兼顾的学者。

他外祖父曾在北海道大学的农学部供职，到过台湾阿里山调查过林相，受此启示，斯波遂生一心愿，盼望有朝一日得乘森林火车，上阿里山观游古木参天的神木区。趁这次唐奖之行，他便立意携其家人同行，八十八岁的他终得登高眺望日出的美景，圆其长久的夙愿。

末了，容可一提唐奖的花絮：原来唐奖教育基金会不敢怠慢获奖者，故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自然不在话下。但正式宴席拘于形式，累日下来则颇难消受。于是，有晚我便自作主张，邀约斯波教授及其家人出外轻食。“夜上海”餐厅气氛宜人，布置雅致，菜色清淡而有巧思。当晚复有斯波日本友人林秀薇女士穿梭其间，闲话家常，意趣横生，故得畅怀痛饮，宾主尽欢。

另外，自是不容失礼另位得奖者——宇文所安教授。他称：十六岁始识中文，便爱上它，遂以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为终身志业。此举却让他父母忧心忡忡，怕他未来生活无以为继，恐要养他一辈子；竟连他老师亦甚不以为然。可是他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，由于他的坚持和卓越的学术成就，五十二岁(1997)那年便荣获哈佛大学礼聘他为“科伦特大学讲座教授”(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ship)。要知此一讲座的前身，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。可见哈佛对他器重非比寻常！

宇文滞留台北数日，突然思念起西式食物。于是有天午间，遂请他去意大利境外唯二的“花神咖啡店”共享午餐。一杯爱尔兰咖啡下去，宇文先生身心舒畅，再佐以意式福安三明治，秘书见其胃口大开，欣喜万分。个人得与两位得奖者餐聚，更缘言谈之际，增广见闻，受益良多。常语有云：“古之君士欲与名宿鸿儒交，莫不推其心、置其腹，缺一则不可。”诚哉斯语！小子敢不勉乎哉？

（作者为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特聘研究员）